



寻迹 陕北

桥儿沟的天主教堂静静矗立着，斑驳的石墙上爬满岁月的青苔。这座西班牙神甫修建的教堂，曾是延安唯一地道的西式建筑，青灰色的石墙与周围的黄土窑洞形成奇异的对照。正是在这里，一群穿着粗布衣裳、吃着小米饭的文艺青年，在抗日烽火中开创了中国现代文艺的新纪元。

那所学校的名字，叫鲁迅艺术学院。

1938年初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《创立缘起》，他们决定，以鲁迅的名字命名这所学校，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。4月10日，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北关云梯山麓正式成立，设戏剧、音乐、美术三个系，后又增设文学系。毛泽东题写了“紧张、严肃、刻苦、虚心”的校训。

在抗日烽火中，这所学校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精英。茅盾、冼星海、艾青、何其芳、周立波等曾在鲁艺任教；贺敬之、穆青、冯牧、王昆、于蓝、郑律成等均为鲁艺学员。仅办学七年，培养学生近七百人。课堂设在狭小的窑洞里，教员仅五十余人，今日看来却都是艺坛巨擘。他们既是艺术家，也是生产者，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，开荒上千亩，种粮食、纺羊毛、烧木炭——在劳动中磨炼意志，铸就了崇高的信仰和浪漫的情怀。

走在鲁艺旧址的窑洞前，我想象着当年的场景：冬夜里，窑洞外寒风刺骨，洞内油灯如豆，年轻的学员围坐一起，听冼星海讲作曲，听何其芳谈诗歌。那油灯的光虽然微弱，却照亮了一条中国文艺的崭新道路。

1939年春，诗人光未然躺在延安的病

床上。几个月前，他两次渡过黄河，目睹了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惊心动魄。在病床上，他用五天时间，将自己渡黄河的经历和在吕梁山的战斗生活浓缩成四首行诗。3月11日，在一孔窑洞里，就着一盏昏暗的油灯，他用低沉的声音朗诵了《黄河船夫曲》《河边对口曲》《黄河颂》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《黄水谣》《黄河怨》《保卫黄河》《怒吼吧，黄河！》这八个部分的《黄河大合唱》歌词。

当诵咏声戛然而止，冼星海冲上前一把抓住歌词，激动地喊道：“我有把握把它谱好！”随后，他抱病完成了全部曲谱。1939年4月13日，《黄河大合唱》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，合唱队不到三十人，乐队也不过三十人，但天然的气势却仿佛有千军万马奔腾在舞台上。5月11日，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，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师生再度演出。演出前，他再三嘱咐合唱队员们：“要尽情歌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，要把我们的全部感情灌注到歌声中去。”

《黄河大合唱》从延安的窑洞飞出，飞向全国、飞向世界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。那怒吼的黄河，正是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的心声。

与音乐创作交相辉映的，是鲁艺美术系的木刻版画。古元、彦涵、胡一川、罗工柳等年轻艺术家，以刻刀为武器，创作了大量反映人民生活与斗争的作品。《夺回粮草》《马锡五调解诉讼》《减租会》《人民的刘志丹》——这些黑白分明的木刻，构图粗犷有力，人物形象质朴刚健，震撼了大后方的画坛。鲁艺木刻工作团唱着《到敌人后方去》，带着两百多幅木

刻版画，渡黄河，翻吕梁山，到敌后举办展览。他们的刀锋，刻出了人民的面孔，也刻出了时代的风骨。

鲁艺初期的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学校最初试图在延安复制正统学院派风格，不少师生几乎不与农民往来，把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描写知识分子上。这种“关门提高”的方式，使鲁艺的创作极大缺乏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。

转机出现在1942年。这一年5月，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，有力回答了“文艺为什么人”和“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”的问题，为革命文艺指明了方向。

鲁艺师生在学习讲话精神后深刻认识到：只在学院的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，还要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大鲁艺中去学习。他们走出窑洞，下乡、进厂、上前线，吸取多种民间文艺样式加以改造发展，创造出一批既不脱离民俗原貌、又增添了文学艺术性的新文艺样式。

1943年春节，由鲁艺自编自演的街头秧歌剧《兄妹开荒》上演，一时风靡延安。师生们选取流传在陕北民间的古老艺术形式——秧歌，创造性发展出集戏剧、音乐、舞蹈于一身的综合性广场歌舞表演形式，谓之新秧歌。随后，《夫妻识字》《拥军花鼓》《周子山》等秧歌剧纷纷出炉，轰轰烈烈的“新秧歌运动”由此展开。贺敬之写出了《南泥湾》《翻身道情》等广为流传的歌词；《白毛女》的创作团队是一群平均年龄约二十五岁的年轻人，这部民族歌剧后来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。

从“关门提高”到“深入生活”，从窑洞里的书斋到延河畔的广场，鲁艺的转

变，不仅是一次创作方法的革新，更是中国文艺精神的一次深刻重塑。它宣告：文艺的根，不在象牙塔里，而在人民生活的广阔大地中。

站在桥儿沟的窑洞前，我仿佛看见八十多年前那些青春的面庞：二十岁的贺敬之在油灯下写着《南泥湾》的歌词；三十出头的冼星海在简陋的窑洞里谱写着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旋律；古元、彦涵蹲在黄土坡上，用刻刀在木板上刻下人民的面孔。他们都是那样年轻，却用艺术点燃了一个民族的希望。

延安鲁艺文化中心的一位讲解员说得好：延安鲁艺以民间文化为媒介，描绘出中国现代文艺的新版图，使中国的新文艺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中生长发育并走向成熟，促成了人民文艺的建构。如今，三十多所高校和文艺院团都赓续着鲁艺的红色血脉。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旋律仍在延安大剧院唱响，新秧歌的舞步仍在桥儿沟跳起。老一辈鲁艺艺术家的作品，仍在激励着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。

夕阳西沉，金色的余晖洒在桥儿沟的教堂尖顶上。那些曾在窑洞里燃起的文艺星火，从未熄灭。它们穿越八十多年的时光，依然在这片黄土地上闪耀，照亮着每一个追寻文艺初心的后来者。

我心中的延安，不只是一座城、一方土，更是一座灯塔。它以鲁艺为代表，告诉每一个文艺工作者：艺术的根在人民，艺术的生命在大地。从窑洞发出的中国文艺，走过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烽火，走过了新中国建设的岁月，如今正走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。而那份“艺术为人民”的初心，如同一束永不熄灭的灯火，从延安的窑洞传出，一代代传递，生生不息。



诗海 泛舟

陕北，写就千年长卷

刘玉花

陕北，我的家乡
黄土高原，苍茫纵横

谁曾知晓，千万年前的陕北
江河奔腾，鱼在云中飞，鸟在水中游
地壳几番抬升，几番沉降
才沉淀这方雄浑黄土
山崩起伏，黄土静默
铺展大地最苍凉的脊梁

石峁遗址点亮远古曙光
石城巍巍，镌刻华夏先民文明
铁马金戈湮没岁月长河
统万城垣守望千年沧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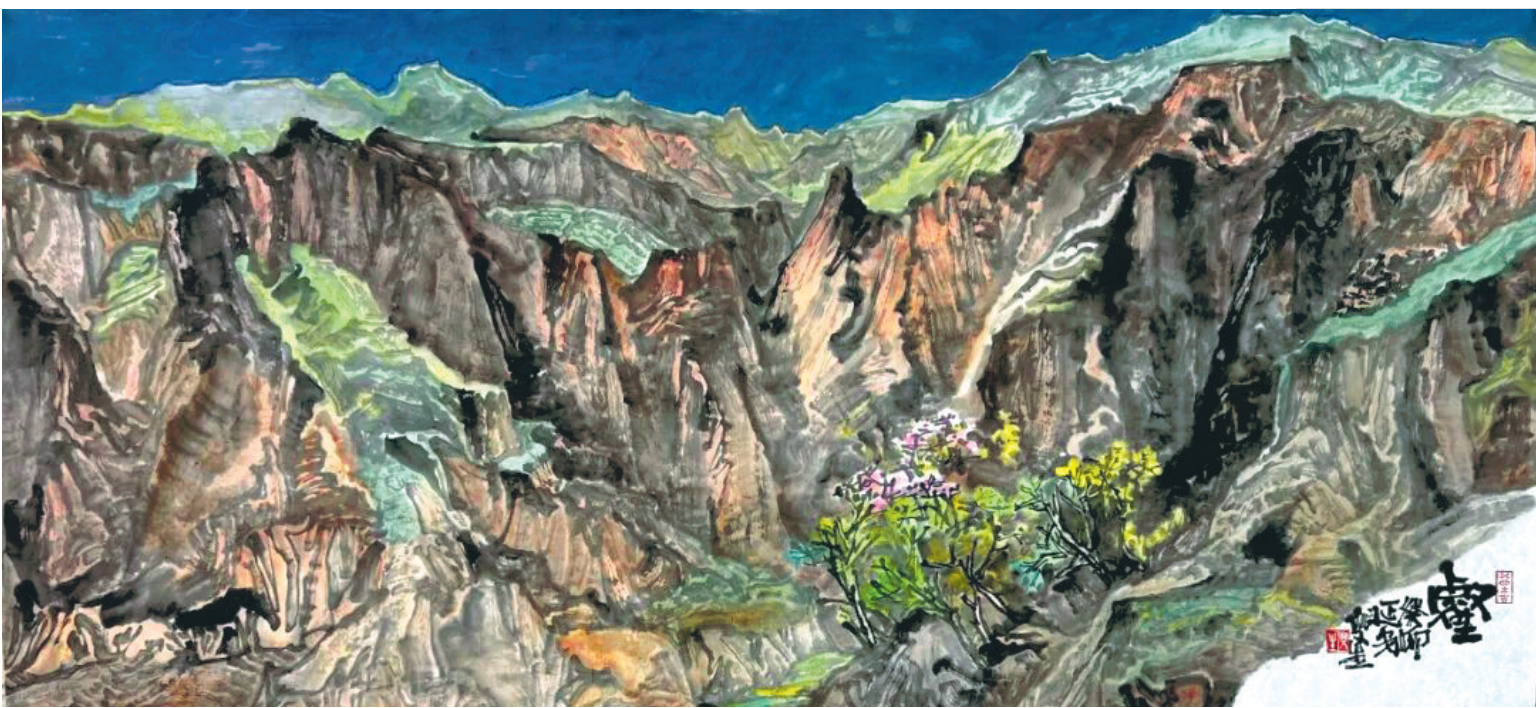
桥山之巛，黄帝陵肃穆
华夏根脉，绵延不息
炎黄信仰，续写五千年文脉

延安宝塔，点燃红色星火
杨家岭灯火，照亮新中国
红色血脉，筑成不朽长城
延安，延安，挺起民族脊梁

贫瘠的黄土，亦有芬芳
清涧红枣，米脂小米
洋芋粉条，陕北苹果
每一味特产，都是大地的馈赠

陕北，神奇的土地
每个陕北人，都是一道密码
每道山岭，都藏着一段历史、一个红色故事

这就是陕北
地质变迁的奇迹，千年文脉的流淌
远古厚重，红色滚烫
风物多情，人民刚强
一抔黄土藏千秋，一缕清风诉衷肠
伫立时光，延续岁月，万古流长



壑

艾生 作



物语 微思

《瓦尔登湖》是作家梭罗来到瓦尔登湖边，自己砍树盖了一间小木屋，只花费了不足三十美元，又种了点豆子维持生活，亲身践行极简生活体验，并将这段经历记录成书。

默契的是，“五一”假期的第三天，远方的朋友就我写的《享受寂静的假日》，回复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如果什么也没有了，我们还有热爱的文学！”

看后真觉三生有幸，感谢朋友懂我。这些年，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些豆腐块文字，打发闲暇时光，也填补内心的短缺。

不管是梭罗还是朋友，都是追求物质简约、精神丰盈的人，不在意外在的评论，不介意他人的议论，干净做人，干净做事，何其难得。

而这，也是我追寻的一种生活状态：双向奔赴，走向极致的简与素。

简，是物质从简，从繁琐到简约，不管是家庭装修还是日常用品，随着岁月的磨砺，简装更耐用更耐穿。心境也随之悄然改变，心底的欲望如同涨后退去的潮水，慢慢平复，露出柔软本真的沙滩。

如今，我仍拎着28年前买的黑色提包，手柄磨损后，只花了60元更换，用起来没有一丝的违和，感觉很棒。21年前的套装也被我保护得超好，香槟色增加了简约的美感，利落的设计彰显了衣饰的年龄，熟悉的朋友很诧异，结识的好友也难相信。还有不少十几年前的衣服、包包安静地码在衣柜里，按季节出场，穿梭于天南地北，依旧让我自信从容。

简与素的力量

宋莉萍

素，是精神纯粹，从浮躁到干净，不管是灵魂还是精神，都是相互契合的终极追求。如果欲望膨胀，需求越来越多，无法止步，心气便会燥热。

久而久之，生活圈子也慢慢舍弃：不和烂人纠缠，不和小人交往，安静地过日子。尽管诗意的触不及不到的远方，但柴米油盐如繁花盛开，盛在洁净的灵魂上，开在善良的初心里，不怕风雨淹没，不惧海啸吞噬，一个人也能无畏前行。

现在的我，对奢侈品已经绝缘，对高档服饰只瞧不买，即使销售人员极力赞美，也不再妥协下单。当然，诸如夏天的T恤、短袖、内衣是需要定期淘汰更换的，算是对自己的小小奖赏。

现在的我，不喜欢高朋满座，不追忆

过往的对错。一盘清水老豆腐，沾点海盐就能满足味蕾。再进行一场瑜伽修行，放飞郁闷的心情，打开封闭的天窗，完成自我救赎，坦然接受自然的回馈。

简与素，是时光赠予的奖赏，亦是精神的舒展。因为时间不会回头，人生没有如果，失去的不会回来，错过的不再重来。任何事、任何人，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年轮往复循环，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简与素自有力量，它让我学会感恩、懂得珍惜、包容他人、善待亲友，生活处处流露美好，也不断积攒着向善向美的力量。

简与素的力量，恰好印证了“相信相信的力量”，也让我愈发懂得知足常乐。



回家的路

征文选登

回家的路，是刻在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印记。它蜿蜒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，穿梭在岁月的风尘里，一头连着远方的漂泊，一头系着故乡的炊烟。作为土生土长的90后延安人，我虽没亲历过父辈人背马驮的艰辛，却在成长岁月里，亲眼见证这条归途越走越宽、越行越快。如今西延高铁通车，延安正式迈入高铁时代，这条回家路，也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每一个归人。

我记忆里的回家路，是从祖辈口中的泥泞开始的。常听爷爷念叨，年轻时去县城赶集，天不亮就得动身，翻山岭、跨沟梁，一双布鞋磨破底，几十里路要走上一整天。雨水路滑摔倒是常有的事，黄土裹着泥水，回家成了最熬人的跋

涉。这些画面我虽未曾亲眼所见，却成了我对故乡归途最初的认知，藏着老区老一辈人的辛酸与坚守。

等我记事时，老家已通了砂石路，颠簸的班车成了连接乡镇与市区的纽带。小时候跟着爸妈坐班车回老家，大巴身摇摇晃晃，车轮碾过碎石发出咯吱的声响，大家揣着干粮、拎着各式各样的礼盒，唠嗑声裹着烟火气，听着格外暖心。可路途依旧漫长，辗转倒车、排队候车、火车晚点是常态，逢年过节更是一票难求。小小的我趴在车窗边，总盼着路能再平一点、车能再快一点。

长大以后，高速公路横贯黄土高原，回家的路彻底提速了。平坦的柏油路绕着青山、穿过村落，自驾归乡说走就走，

回家的路

高卓瑞

打开导航跟着流畅的路线指引，三个小时就能从周边地市赶回延安。窗外的风景也换了模样，昔日光秃秃的黄土坡披上了绿衣，崭新的民居错落有致，潺潺河水绕着宝塔山，故乡的轮廓，在疾驰的车轮里越来越清晰。

银白色的复兴号穿梭在高原之间，时速350公里，把远方的牵挂瞬间拉近。我也曾坐着高铁往返周边城市，刷脸进站、智能候车，车厢平稳又宽敞，窗外秦岭苍翠、渭水辽阔，黄土沟壑一闪而过。曾经大半天的路程，如今一盏茶的功夫就能抵达。延安站台上“欢迎回家”的字样，总能戳中心底最软的地方，出站口父母翘首以盼的身影，依旧是归途最美的风景。

从祖辈的泥泞土路，到父辈的班车、绿皮火车，再到我们这代的高速高铁，回家的路越走越快，也见证着延安从贫瘠到富足的蜕变。这条路，是时代发展的缩影，更是刻在延安人骨子里的多愁载体。

路途的模样在变，抵达的时间在缩短，可那份奔向家门的期盼、渐近故乡的悸动、推门而入的温情始终没变。作为90后的延安青年，我守着这片热土，看着归途日新月异，更懂这份变迁背后的时代荣光。

回家的路，从来不止是脚下的行程，更是心灵的归途。路再远终有归期，车再快乡情不改，这方黄土的深情，永远是我最深沉的眷恋。



延州 风物

雨谒杜公祠

李绥宁

细雨如丝，缠裹着天地间的静谧。车行至延安七里铺时，“杜公祠”三字猝然入目，便决意踏雨拜谒这位跨越千年的“诗圣”。

未入祠先见杜甫雕像，其清瘦挺拔的身躯矗立于素净无华的殿堂之中，仰头望天的姿态，恰是他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的一生缩影。眉宇间凝着化不开的忧色，目光穿越时空，似仍在茫茫天地间寻觅救民于水火的曙光。

沿右侧石阶上行，清道光年间扶施县令陈炳琳所题门联“清辉遥接鄜州月，壮志长雄芦子关”静静嵌在门楣，墨迹润着岁月的古朴与沧桑，恰是诗人半生颠沛的无声注脚。

偏园“北征遗迹”是此行最动人心处，这里正是杜甫当年“枕鞋夜息”之地。安史之乱骤起，诗人携家逃难，经白水、华原辗转至鄜州羌村安顿妻儿，随后孤身北行欲投肃宗，却在延州七里铺的石崖下燃篝火露宿。彼时他所见的，是《三川观水涨》中“高浪垂翻屋”的洪水毁田惨状，是羌村百姓“世乱遭飘荡”的刻骨悲苦——延州的寒风，与他日后在夔州、潭州遇见的寒凉并无二致；路上流民的愁容，与新安、石壕百姓的苦难如出一辙。那些蘸着血泪的诗篇：《羌村三首》里“夜阑更秉烛，相对如梦寐”的悲喜交加，皆与这片黄土文脉深深相连。北征遗迹石崖上，“诗圣”二字力透纸背。他从不是书斋里吟风弄月的遣兴者，而是踩在泥土里、浸着血泪的记录者，用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执着，为苍生写下一部鲜活的“史诗”。

临别回望，风过“杜公祠”门楣，恍若听见千年前那声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的叹息——却无半分自怨自艾，唯有对这片土地、对土地上百姓的牵挂。今日来此，从非简单的“打卡”或“凭吊”，而是隔着时空，接他递来的那支“笔”：懂了他的忧，才算读懂他的诗；记着他的“真”，才算不负这场跨越千年的相遇。

转身时，忽然发现，雨仍淅沥。雨幕中，川流不息的车辆缓缓礼让行人，暖意漫过心头。忽然想问：若杜公见此盛世，又会写下怎样的诗篇？或许，他当年期盼的“曙光”，早落在今日烟火里。



楊家嶺



Yangjialing 邮箱: yjlw@126.com